

虽大部分刊发于《新青年》，但不代表鲁迅附和同仁们，也不代表他就加入了特定的流派，反而有些格格不入，故，才有著名的“铁屋”譬喻。

副刊》连载)更不消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每个中国人内心遮羞布的逼问,“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却是可鄙的共情,假洋鬼子更是媚外的翘楚,深入人心。

所有这些都编入了1923年出版的《呐喊》。所有这些几乎都以虚构的“鲁镇”为背景,但又都是作者熟悉的故乡,国人熟悉的故土。虽大部分刊发于《新青年》,但不代表鲁迅附和同仁们,也不代表他就加入了特定的流派,反而有些格格不入,故,才有著名的“铁屋”譬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

希望于鲁迅是“我之必无”,于钱玄同、胡适之、陈独秀等则是“他之所谓可有”。所以“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一场本可以向社会底层发展的思想解放的五四运动短短几年便偃旗息鼓,鲁迅心中的确困顿。但鲁迅矛盾而启发的一面是他“呐喊”而并不绝望,尤其对平民,对普罗大众,他的可贵体现在:极大的同情,但也绝不美化和理想化。

《狂人日记》总结“四千年历史”无非就是“吃人”二字;《呐喊》则是鲁迅辉煌期的开始,李大钊收到赠书后评:

“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研究指出,在中国现代出版业方兴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呐喊》的出版具备标志性意义。据王世家等统计,新潮社与北新书局一共将《呐喊》印刷了24次,总印数无法估计,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图书馆、收藏单位或个人能将《呐喊》24版印本收集齐备。”保守估计,“到了1939年的《呐喊》第24版,其单行本总印数恐怕将逾10万”。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是新文化运动中当仁不让的启蒙读物,旗手正式登台。

矛盾而怀疑,新文化的多面手

旗手难免会被神话、物化,鲁迅也难逃生前身后的各种小心思。先生经历了自日本归国后相当长时间的沉寂,结教育部小官僚式之不甘,郁录古碑、阅古籍、哀时局之块垒,《狂人》横空出世,《呐喊》无声惊雷,而其真实内心始终为世人隔阂。新文化运动虽然让“鲁迅”的声名响彻神州角落,但先生自己深知,“热闹是他们的”。1925年,中共党组织发动各校学生声援北京女师大学生的斗争,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7人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此时他虽然是战斗的,但五四的余威已荡去,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各处混战,民众根本没有从共和体制中汲取任何养分,身子与思想依旧贫弱。鲁迅此刻是深刻怀疑的,他写下“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南北朝诗人谢朓此句可衬托先生彼时心境。1919年前后投身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风云人物过早投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